

# 我永遠的台中一中\*

施正鋒

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學系教授

## 台灣民族意識的啟蒙

所謂「鹿港施一半」，阮的舊厝是在鹿港（四方院的前身），是在日本時代搬到阿罩霧，而我就是在霧峰出世的。我們從小隨著父親住遍台灣，最後在彰化落腳，終究還是選擇通勤讀台中一中，除了土地認同外，更重要的是父親是一中畢業的，讓我有強烈的回去唸一中的使命感。後來，即使台大畢業、到美國拿到博士學位，然而，真正讓我覺得自豪的還是一中的身份，特別是她在台灣獨一無二的歷史地位。

高中聯考作文掛零，低分掠過考上台中一中。我們這一屆（國中第三屆）的錄取分數創下歷史紀錄的低，校長從入學到畢業唸了三年，果真應屆只有一人考上台大醫科。高一的導師彭紫雲教國文（苗栗公館客家人，戰前日本青山學院畢業，2010 仙逝），恰好是父親二十多年前的先生。除了家父，伯父、家弟、及侄子都是一中畢業的。學長廖慶洲曾經為文表示，鹿港施家沒有捐錢建校，可惜曾祖父早逝，否則妻弟林烈堂、林獻堂、及友人蔡蓮舫熱心捐輸，應該也有他的份。

我們都知道，台中一中是台灣人自己出錢出力所設立的學校，在此之前，台灣人只能讀教會辦的淡水中學、或是長榮中學（祖父前往東京醫專之前，就是先唸長榮中學）。在日本時代，一中的學生來自全台灣，大家共同感受到作為台灣人的悲哀，至少要在精神上作抗爭，因此，這裡是培養台灣人意識的所在。當年只有日本人的學校才可以稱為一中，雖然日本政府曾經試圖將台中一中改名為二中，而我們的前輩就是不屈服，因此，在被殖民時代的台中一中，儼然是台灣民族意識的重要象徵之一，要了解台灣民族運動一定要研究她的發展。

一中自來就不是一間區域性中學，英雄好漢來自全島各地。我在一中的期間（1973-76），同學中間除了有台中人，也有眾多來自彰化、以及南投的通勤生，更有自苗栗、雲林、甚至於嘉義慕名而來者。被殖民者要跨越家鄉、凝聚反殖民的集體認同，中學往往是的第一個民族整合機制，再來是大學、或是當兵；在台灣，由於大學、以及軍隊受到國民黨緊密的控制，只剩下台中一中精神抗爭的傳統，讓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徬徨少年，開始有思想自由馳驅的空間。

---

\* 台中一中 100 週年傑出校友專刊 2015/03/23。

在懵然無知的狀態中，我們隱約知道當年的學長如何與日本人抗爭，而戰後的二二八事件，一中人當然更沒有缺席。因此，不論是在大禮堂的週會、或是在操場的朝會，與教官貓捉老鼠地周旋，是我們至少能進行的無言抗議。在圖書館裡，學長可以叫低年級的起立，我們會欣然，因為讓位，只要不是那種要替學長擦皮鞋學、或是拳打腳踢的日式作風，這種不是國民政府帶來的傳統，反而是提醒我們有共同被殖民的經驗。

戰後，引頸企盼幻滅，即使國民黨的黨國體制緊扣不放，然而，台中一中所蘊藏的台灣精神，仍然在無言之中傳承下來。黨外雜誌《台灣政論》出版以後，數學老師黃呈明（彰化線西人）要我們趕快去買，不然，很可能馬上會被查禁，埋下有為者亦若是的種子。對於一個懵然無知的少年家，除了課本所填鴨的東西，所求的也不過是老師所指示的明燈，台大做不到，臥虎藏龍的台中一中，讓苦悶的學子在黑暗找到一線光明。印證 Benedict Anderson 在《想像的共同體》（Imagined Community）所說的，現代的印刷術快速傳播民族意識，讓那些素未謀面的人可以凝聚成一種具有福禍與共的「民族」，想要有自己親手擊建的國家。

然而，或許是因為台中一中過去的抗爭精神，讓國民黨對於台中嚴加打壓、防範，特別是拉攏一些一中出身的政治人物，難免讓外人產生被羈縻的印象。也或許是省政府在中興新村、以及省議會在霧峰的關係，長期大軍壓境，讓外人以為台中沒有骨氣；在重北、輕南的習慣下，中部往往是被忘掉的淪陷區。因為歷史脈絡的制約，我們不敢臧否過去的政治人物如何做選擇，不過，具有台灣本土精神的一中人，我們既然不是幫兇，就應該為台灣的歷史扮演更積極的角色，或明、或暗，大家作伙來衝破外來統治者所硬加的精神枷鎖。

## 我是一個失敗者

先前，在花蓮回西部的太魯閣號火車上，忽然接到一通高中同學的電話。台中一中畢業三十五年，從來沒有辦過同學會，當然是覺得相當興奮。可惜，由於北迴線隧道太多，手機接收不是很清楚，回到台北，竟然忘了。過年回台中，聯絡到另一位同窗，才知道，他們是在醫界的募款餐會上碰面，問起我來。

其實，黃呈明老師也有同樣的疑問，到底在電視上看到的那位名字一樣的，是不是當年教過的學生。這位在豐原開業的老同學，立即上網查學校的網站，一通電話就聯絡上了。多年沒有見面，然而，手機傳來的聲音卻還是跟往昔一樣，倍感親切。特別是高中成績沒有十分突出，沒想到還有老師記得自己。

如果由傳統的標準來看，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。因為高三唸丙組，同學大部分在醫界，只有我一個人當逃兵，竟然轉行到政治學。由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，一百八十度大轉彎，這在過去幾乎是不可能想像、也不允許的，因為聯考的科目差別太多，無法從頭準備起。要不是陰錯陽差，考上丙組當中唯一最像社會科學的農業經濟學系，絕對不會有機會去了解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，更不可能進一步出國念政治學。

回想當時，同學來自中部幾個縣市，大家不是私立初中磨出來的、再不就是國中一二名畢業的，背著書包走在台中的街道上，總是有幾分傲氣。然而，隨著升學的壓力越來越重，並非所有的人都還可以故作瀟灑狀。最讓人無法接受的是，平日上課還算可以正常學習，然而，只要月考到了，就必須為了準備考試而停頓下來。

其實，自己滿喜歡數學的，還會去找一些課外的東西來看。只不過，考試是講求速度的，並不允許太多的思考，因此，答題的技巧成為得分的保證，實在不合乎人性。另外，化學也應該滿好玩的，只不過，老師一再告訴我們，三分之一是可以理解、三分之一沒有答案、三分之一靠死記，而每次問道的剛好是落在那無法回答的三分之二，言下之意，再問也白問。再來，由於丙組不考物理，老師不敢教太深，免得被學生鎖在教室外面，因此，也錯失登堂入室的機會。

記得當時，數學底子比較好的都要念自然組，如果要去念社會組，一定會被老師罵死，因為這會拉低學校的升學率；同樣地，如果數學不太行的人要讀自然組，恐怕也不會被接受，還是整體考量學校的升學率。只不過，為了顧全大局，多少人的性向卻被抹殺了。

我自己是陰錯陽差，既然考不上醫學院，又沒有認真聽學長教如何填志願，從此就轉跑道了。年前，高中同學安排到醫學院演講，看到下面穿白袍的準醫師，雖然沒有百感交織，卻忽然有點不知如何的感覺。要是當年認真一點，對於國文、以及三民主義願意多背一點書，不要太堅持用腦筋去思考書中的道理，或許可以讀得快樂一點，也可以符合家人的期待。

坦白說，雖是如願進入台灣大學，農學院的氣氛並不是那麼陽光，因為，大部分的人都是考不上醫學院才落點到這裡，有點像是落第的秀才，跟其他學院比起來，彷彿頭永遠都抬不起來似的，連女生都不願意跟農學院的男生辦舞會、或是出遊。話又說回來，如果真的要我聯考參加乙組、或是丁組，那種貝多芬(分)的氛圍，不是我喜歡的，也很也可能名落孫山。

對於個人來說，當時有點「過一天和尚、敲一天鐘」的無奈，就像當兵的義務一樣。喜歡的課就認真一點，遇上不喜歡的課，就把原文書當作練習英文。因此，經濟方面的基礎還算可以，英文也滿有興趣，又到法學院修一些課，打下日後出國唸政治學的基礎。更重要的是，或許是因為自然組出身，在美國唸碩士、博士得心應手，與科班出身的台灣同學有不太一樣的看法。

回想起來，若非有機會出國，又碰上美國大學開明的風氣，鼓勵學生挖掘自己的性向，恐怕這一輩子就在自卑、懊惱中混過去了。目前，我除了不斷吸納政治學的新知識，並能把外國的學術東西引入運用，又能引介給一般人看，可以說是如魚得水。真不能想像，萬一今天不是政治學者的我，究竟會如何。因此，要感謝當年的挫敗，讓自己有機會好好反思，勇敢去追求自己想要的。

多年來，一直有機會到海外參加台灣人的活動。不管是演講、座談會、還是私下的聊天，同鄉往往會問如何貢獻故鄉。我發現，同鄉的子弟都相當優秀，而且不少人唸醫學院。我通常會告訴他們，如果可以的話，可以鼓勵一個小孩讀政治學、或是法學，比較有機會參與當地的政治。先前，大家都在瘋林書豪，問題是，如果他是在台灣長大，即使父母同樣有勇氣，不過，在陪小孩長大的過程，相信必須面對師長親友的異色眼光、以及無比的社會壓力。

坦誠而言，不論是海外、還是國內，有互動的台灣政治學者不少，就是很少是台中一中畢業的。對於被殖民者而言，念法律可以自保，當醫生比較穩定，要賺錢就去念商學院，就是很少人想到要唸政治學，因為，這是統治者的專利。台灣人頂多只可以唸公共行政學，也就是當公務人員。台灣人如果要真正當家作主，應該讓一流的人去念政治學。不要委曲求全，也不要看人的臉色。這是我們台中一中的責任。

在台北市的台中一中校友會當中，我算是比較年輕的；多年來，前輩對我照顧有加，並且讓我當校友基金會的董事，心存感激。